

二戰前霹靂華人政治參與—以鄭螺生、連瑞利、鄭大平和梁燦南以例

陳愛梅（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前言

以霹靂州之華人為例，這篇論文主要探討二戰前英屬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參與。二戰前英屬馬來華人的政治活動主要分二：傾向中國民族主義；及在地化的扎根主義。在霹靂華人參政者當中，有人親中國，有人往地方政府靠攏，也有人遊走於兩者之間。

王賡武在討論馬來亞華人政治參與時，關注了華人政治參與者的多元性，從熱中中國政治運動，到文化上遠離華人性（Chinese-ness）的華人從政者。他在“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一文中把馬來亞華人的政治參與分為三組：一、熱中於中國政治活動，認為中國才是正統，影響他們及給他們帶來榮耀的政權；二、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但領導當地的華人團體；三、土生華人，不諳中文，英文能力佳，為殖民者所喜好。除了以上所述之三大類型之華人政治參與者外，本文將提出第四種之華人從政者，即：雙重政治身份。以中文書寫的研究學者，如台灣之學者，關注英屬馬來西與中國的關係。因此，他們在著作中會關注到親中國，尤其是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從政者，如鄭螺生及林源水。另一方面，以英文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人物誌——*Biography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親中國政權的人物，如鄭螺生、林源水和余東雄等，並沒有被收錄進來。這本著作的其中一位編輯，周敏嫦（Chow Mun Seong）諳中文，顯然地，語言的局限並不是親中國政權的人物沒有被收錄的原因。該著作對人物的編選的條件，是：「他們的生平事蹟堪稱楷模及效仿」，那本人物誌在馬來亞獨立四十年後出版，親中國，及為中國革命犧牲的英屬馬來亞人物並不能視為時代的楷模，所以，他們沒有被收錄在內，也是想當然爾的事。在霹靂州華人人物書寫方面，李永球在 2003 年所出版的《移國：太平華裔歷史人物集》是第一本為霹靂華人立傳的專書。

歷史回歸史實，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本文將以探討四個霹靂州的從政者，來談論華人社會的多元性。在史料使用上，這篇論文使用了英殖民政府的檔案資料，馬來

亞出版的中、英文報章，民間碑文，及收藏在台灣國民黨相關檔案，以刻劃出二戰前華人在馬來州屬的政治活動面貌。

霹靂州華人與政治

這篇論文所談論的政治參與，是指具合法性(legitimacy)政府所委派，或透過競選獲得政治地位。霹靂州二戰前的華人政治參與，主要分兩部份：一、由英國殖民官員所所主導的霹靂州議會；二、熱中於中國政治，從辛亥革命前的保皇派與革命派，到後來的國民黨。雖然二戰的英屬馬來西亞已有共產黨的活動，但二戰前共產黨未掌握中國政權，所以也沒有由具合法作的政府委派他們官方的政治角色。因此，這篇論文並不把活躍於共產黨的人員納入討論。

地方性政治——霹靂州議會

英國在 1874 年插手霹靂州事務後，派遣畢治(J. W. W. Birch)當任霹靂州第一任參政司(Resident)。他以強硬的手段管理霹靂州事務，引起霹靂州馬來統治者及大臣的不滿。於是，畢治在 1875 年 11 月 2 日在巴西沙叻(Pasir Salak)遇害。在這場稱為霹靂戰爭(Perak War)的鬥爭中，霹靂州蘇丹阿都拉沙 II (Sultan Abdullah Shah II)被驅逐到非洲的塞吉爾(Seychelles)；大臣馬哈拉惹里拉(Maharaja Lela)遭問吊。華人顯然並沒有介入這場英、巫之間的戰爭。隨著畢治的遇害，英國第一階段的參政司管理實驗宣告告一段落。

當事件平撫後，海峽殖民地總督澤維士(W. E. Jervois)建議在馬來保護州屬(Malay Protected States)成立混會議會(Mixed Council)，他在呈給海峽殖民地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加拿芬(Earl of Carnovon)的建議書中表示：

對於我來說，霹靂州的問題，不管是要遵守英國官員以蘇丹之名進行管理的約定，還是把這個州屬視為英王的領土……我的看法是，依照目前的局勢，我們必要做出調整。我的建議是，成立混合議會，包含英國官員、馬來人和華人，而這是可行及有價值的。

加拿芬在建議書中強調華人的重要性。他保證，在英國的管理之下，勤奮的華人會湧到這個州屬。華人及英人資本的湧入會改變這個地方的面貌。他以威利斯省(Province

Wellesley) 為例，說明那裡曾經是蠻荒之地，不過如今卻是農園，僱用了成千上萬名印度、華人及其他族群的勞工。霹靂是富於農業及礦業的州屬，他相信在以適當的方式引進移民及勞工後，馬來人的數目將被超越，及很多問題將可以獲得解決。

輔政司加拿芬 接納了總督澤維士的建議。1877 年 6 月，霹靂州議會成立，這是繼雪蘭莪在三個月前成立的州議會後，成為第二個成立州議會的馬來州屬。成立之初，霹靂州議會共有八名成員：兩名英國官員（正、副參政司）、四名馬來領袖和兩名華人代表。鄭景貴及陳亞焱被英方委任為華人代表。這兩位在拉律之戰的死對頭，在霹靂州議會中同朝為官。他們在州議會中與英殖民官員及馬來領袖共商州事，正式拉開霹靂州華人參與霹靂州政治的序幕，也奠定了霹靂州政治的多元種族性基礎。

根據霹靂州議會早期的會議記錄(1877-1879)，鄭景貴及陳亞焱主要是針對華人相關事務，如礦務事務、人頭稅等事項發言，在兩位曾稱霸一方的領袖結束了在「國中之國」(*Imperium in imperio*) 稱王的局面，他們雙雙被英政府收編，被封賜為霹靂州華人甲必丹。從 1877 至 1941 年，霹靂州共有 11 名華人被委任為霹靂州議員，包括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和僑生華人。本文無意替他們立傳，而是挑選了其中的四個人，代表不同典型的華人參政的模式。

在未進入各別的討論之前，本文先對中國政治對霹靂州的影響做個簡介。

中國政治的影響

中國政治對英屬馬來亞的影響，學者如顏慶滄、Png Poh Seng、Stephen Leong、楊進發、黃建淳等，都做了相當詳細的論述。在談論這項課題時，學者們主要以海峽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和檳城為主要討論的對象。相較之下，馬來州屬雖然幅員廣大，但並沒有獲得太多的關注。新加坡、檳城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在政治運動上往往扮演指揮的角色，獲得關注是當然爾之事。霹靂州之政治參與者，雖然不及海峽殖民地的菁英般在英屬馬來西亞擔任智囊的角色，但他們在政治運動中的自主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海外華人，從「天朝棄民」到「華民」，間中有著即曲折又現實的變化。海外華人的「鬻官」，是與清廷建立在互惠的關係上。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在霹靂州議會擔任州議員的華人，同時又確定擁有清朝封賜的官銜的是鄭景貴、胡子春和武許安。值得關注

的是，並不是所有被清廷委派擔任官員的華人都擁有官銜，如梁碧如。梁碧如在 1897 年替代許武安，成為霹靂州州議員。1902 年，梁碧如取代病重的謝春生，成為中國駐檳榔嶼代副領事。之後，梁碧如升為副領事。雖然貴為清朝駐外使官，但根據 1096 年檳城極樂寺的「功德碑」碑文，當時的梁碧如並沒有任何的官銜。除了梁碧如外，在霹靂州擁有清政府封賜的官銜的華人都只是虛銜，沒有實際上的政治參與。黃賢強在〈客籍領事梁碧如與檳城華人社會的幫權政治〉一文中已針對梁碧如與中國的關係做了相當完整的論述，故本文將不贅述。

虛銜不等同政治活動，但這當中也有例外的人物，那就是胡子春。胡子春是保皇派的中流砥柱，其名氣之大，甚至使孫中山等人漏夜搬離酒店。根據張永福在《南洋與創立民國》中的記錄，孫中山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創立同盟會後，便北上怡保，入駐「新改良局」酒店。是夜，人們告訴他，胡子春在怡保的保皇勢力十分強大，他聽聞後趕緊搬離「新改良局」。「新改良局」應該是當時怡保著名的酒店，胡子替在 1907 年在「新改良局」設宴歡迎清庭使者。怡保的同盟會是由汪精衛所建立。成立之初，霹靂同盟會的主要通訊是：壩羅湯伯令，羅萬成號林源水，和吉承隆號鄭螺生。

在 1910 年之後，英屬馬來亞有 18 個同盟會分會，其中 6 個分會設在霹靂州。當時，同盟會以閱書報社及戲劇社的方式存在。民國建立後，英國承認中華民國為合法政府，馬來亞之國民黨在「社團組織法」(Societies Ordinance)下取得注冊，成為合法社團。1913 年，霹靂州共有 27 個國民黨分會向英政府注冊，而霹靂州國民黨之活躍份子，在開會前都會向華民保護司(Chinese Protectorate)申報。馬來亞之國民黨隨著中國政局的轉變而出現紛爭。袁世凱瓦解國民議會後，孫中山到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後，給霹靂州國民黨支持者，如鄭螺生和林源水寫了多封信，以爭取他們的支持。以目前資料所示，霹靂州華人親中的政治活躍者，是支持孫中山、國民黨，甚於合法的中國。國民黨在 1920 年代被英政府勒令解散，1930 年代遭到嚴厲的打擊及管控，直到中日戰爭後，國民政府派吳鐵成到馬來亞與英政府周旋，希望能再次將國民黨合法化。1941 年日軍進入馬來亞，劃下歷史的分水嶺。

霹靂州華人從政者

這章節本主是以華人從政者為例，探討華人在參政上的多樣化性。本文的目的並不是替這些人物立傳，所以並沒有巨細靡遺剖析主人翁生平的企圖。本文將華人從政者分為四種類型：

一、 政與中國政治

這類型的政府參與者熱中於中國的政治，但沒有被居留地政府委任正式的政治職位。在霹靂州，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鄭螺生。

鄭螺生生於 1870 年，少歲時從福建同安來到英屬馬來亞，之後在怡保設立「吉承隆公司」。除了鄭螺生之外，林源水、李孝章等，都是霹靂支持革命黨的領袖。赴中國參加革命的霹靂華人溫生才、余東雄和郭繼枚，在就義前都寫了絕筆書給他們，表達了革命而犧牲的決心。鄭螺生在 1915 年出席了在霹靂中華總商會所舉辦的霹靂華人志願部隊 (Chinese Volunteers Corps in Perak)，在這場由英方及華人民間所舉辦的盛大集會中，一位姓李的華人甚至建議這個華人志願部隊只開放給講英語的華人。顯然的，鄭螺生在這樣的集會上並沒有獲得太多的關注。

1930 年 2 月，原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被調到英屬馬來亞，出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及馬來亞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這位能講中文、福建話及廣東話的總督對國民黨採取高壓的鐵腕政策。鄭螺生，這位國民黨活躍份子，在金文泰上任五個月後就遭驅逐出境。鄭螺生雖然出生中國，但他在居住於霹靂期間已歸屬成為大英子民，因此，金文泰在驅逐鄭螺生時顯得小心翼翼。他等鄭螺生從新加坡前往中國的途中，才簽發驅逐令，以免在技術上落入驅逐大英子民的狀況。和鄭螺生同時被驅逐的還有方之，他們兩人的遭逐，引發中英的外交風波。

1928 年 9 月，國民黨在北伐大抵完成後，就在南京成立僑務委員會，經過幾次改組，在 1931 年 12 月 7 日公佈的「僑務委員會組織法」，遴選當地僑領為僑務委員，並指派僑務專員負責視察僑務狀況。同年，在英屬馬來亞被委為僑務委員的新加坡的陳武烈、李振殿；馬六甲的黃仕元；霹靂州的林源水。較後，僑務委員會人數增加，被委的包括霹靂州的梁宇皋；馬六甲的沈鴻泊；雪蘭莪的陳占梅；新加坡的林文慶、陳嘉庚、胡文

虎、林義順和陳楚楠。這些被委任的委員都是當地領袖，他們的委任是象徵性勝於實際工作。真正替中國國民政府工作的是僑委專員，或視察專員。在 1931 年的「僑務委員會組織法」通過以前，鄭螺生已被正式接任視察專員的工作，並在 1930 年 2 月獲得委任狀。他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情報，尤其是向中央黨部報告共產黨的活動。在獲中央黨部委任為視察專員不久後，他就遭英殖民政府驅逐出境。

被驅逐到中國後，鄭螺生就以華僑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南京舉辦的國民議會。在議會上，他為海外，尤其是馬來亞華人爭取權益，包括替羅次啟，這位來自霹靂的驅逐華僑爭取國民政府的庚子賠款之獎學金，以使羅次啟赴德留學。他再把目標瞄向庚子賠款，希望國民政府拿出部份金錢支助受經濟大蕭條所影響，在東南亞滯留的華人回到中國。他的要求遭到國民政府的拒絕。他的請求，附合時間點並獲得批准的，是 1930 年代中期國民政府對海外華文學校的撥款。由中國官方及海外華人代表所組成的「華僑教育委員會」已在 1932 年通過決議，要求中央政府撥出五萬元予海外華校，但一直都沒下文。1934 年 4 月，他要求中國政府兌現。隔月，新加坡的英文報章就報導中國政府撥出五萬元給海外華校的消息。

提起海外華人對中國政局的貢獻，人們總是聯起到向中國政府提供金錢援助。然而，鄭螺生卻顛覆了這種即定的刻板印象。除了上述的要求外，他還直接向蔣介石要錢支持《民國日報》，這份在新加坡由國民黨黨員所創辦的報紙。在同一封信件中，他也表示中央政府需拿出五萬元，如果國民中央政府欲在馬來亞設立英文報紙。

到了中國後，鄭螺生被委任為監察院監察委員。在任職其期，他也對中國官員進行彈劾。他在 1933 年在南京成立「海外被逐僑胞回國留京同志會」。在 34 名成員當中，28 名來自英屬馬來亞，顯然地這是以馬來亞華人為主的兄弟會。

1937 年的中日戰爭後，鄭螺生就回到怡保。他在 1939 年 12 月 14 日在怡保過逝，並獲得中國行政院院長于右任的褒恤。生於中國，經營生計於霹靂，在中國獲得政治舞台，卻死於霹靂。鄭螺生的生命歷程，雖然是親中的代表政治人物，但也看出他對海外華人之關注，而他的關注，是具差序格局的方式，由內(霹靂華人)往外(海外華人)擴展。

二、不參與中國政治，但領導當地華人

在霹靂州所有的華人州議員當中，他們對當地華人都有特定的領導力，但代表性卻不一致。在這些華人州議員當中，本文選擇連瑞利做為討論的對象，因為他在英屬馬來亞華人有相當的領導地位，但至今當不見他參與中國政治的記錄。

連瑞利(1875-1924)是僑生華人，生於威省，祖籍廣東潮陽縣大埔。他的父親是連仁偉，是霹靂州瓜古樓(Kuala Kurau)種植甘蔗的先驅者，也是檳城潮州幫的領導人之一。連瑞利繼承父業，把他父親在瓜拉古樓 2 千英畝的某蔗園擴大到 4 千 5 百英畝，並僱用歐州人管理。之後，他也種植椰子。當橡膠價格上漲時，他也經營橡膠業。他把企業跨展到跨族群合作，成為 Nellesmay 橡膠公司的董事之一。

雖然在霹靂州當任州議員，但檳城仍然是他社交網絡的重心。他曾擔任檳城平章會館副主任之一、檳城韓江學校創辦人之一。他在 1896 年被委擔任霹靂州議會議員，一直到 1911 年辭去這個職位。在他辭去州議會議員的官職後，他依然活躍於各種官方及民間組織，其中包括威爾斯戰爭基金(Prince of Wales's War Relief)(1914)委員、檳城保良局委員(1915)、檳城華人商務局主席(1917-1918)等。

連瑞利活躍於檳城賽馬公會(Penang Turf Club)，並且是檳城馬球公會(Penang Polo Club)最早的華人成員之一。參與這些組織，除了運動外，更是有助於結交多元種族，尤其是英國官員的朋友。他並沒有直接參與由中國的政治活動，卻扮演調解者的角色。1910 年代中期，檳城的陳新政因替中華革命黨募軍債而遭英國政府傳訊，而險遭英國政府驅逐出境。後來，連瑞利替他向英國當局說項，這場風波方平息下來。

連瑞利不參與中國政治，但他對當地華人具有領導地位。「在人在朝好辦事」，對於從事中國政治運動的英屬馬來亞華人來說，連瑞利具有「朝」的角色，雖然在 1911 年之後，英方並沒有直接賜予他正式的官職，但這似乎不影響他的領袖地位。

三、 土生華人，英校生，為殖民政府所喜好

本文將王賡武這類分類中的「不諳中文，英文能力佳」改為「英校生」，以避免替「中文」做出定義。在筆者所研究的霹靂州華人州議員當中，鄭大平、杜榮和和 K. T. Khong 醫生都是英校生，但他們似乎懂得各別的方言。方言是否屬於中文，這是語言分類上的問題，筆者無語在本文處理語言學上的定義問題。

在以上所提的三人當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受殖民政府所喜好，但最為受殖民政府所器重及恩寵的，應屬鄭大平，霹靂最後一位華人甲必丹。

鄭大平(1879-1935)，生於太平，父親鄭景貴和干華爹陳亞焱都是霹靂州華人甲必丹，家世顯赫。講客家話的鄭景貴將鄭大平送到檳城聖芳濟學校念書，在鄭大平求學期間就已經獲得英文媒體的關注。如同許多富裕之家，鄭景貴的后裔為他所留下的龐大財產打官司。然而，鄭大平並沒有把「錢途」寄望在官司上而已，而是開拓了他父親在錫礦業打下的根基，其中包括創立第一間華人礦業有限公司—督亞冷華人錫礦公司（Toh Allang Chinese Tin Company），聘用歐州工程師監督礦場及使用先進儀器，開啓華人與澳大利亞合資發展錫礦業—近打河鐵船公司（Kampar River Tin Dredging Company）等。

鄭大平是賽馬愛好者，他也愛開車。他熱中於以西方人為主的組織及活動，甚於純華人組織。從《馬來西亞華人銘刻萃編》中所收集的銘文來看，他對華人組織的捐獻，有著他父親的影子。例如，他捐錢給檳城的五福書院、極樂寺和增龍會館，而他的名字，往往與父親之同時出現。顯然的，鄭景貴有意帶領這個兒子進入他所領導或參與的華人組織，但鄭大平似乎更鐘情於西式的活動和組織。

從所收集的資料顯示，鄭大平似乎完全不參與任何與中國政治或政局有關的活動。做為富甲一方的領袖，他的豪宅被用來招待貴賓，包括 1908 年到訪霹靂州的駐新加坡中國總領事孫士鼎，和其他英國官員。在經濟低迷時，他代表華人向英方對話，並且透過霹靂慈善社（Perak Chinese Amateur Dramatic Society）為中國募款。這些活動，都是當時做為華人血統領袖無可避免的社交活動。雖然如此，在具民族主義的反殖民運動中，如 1905 年的反美；1919 年五四運動、1928 年的濟南事件、1931 年的 918 事件等影響英屬馬來亞華人的運動中，鄭大平是缺席的。因此，鄭大平被視為對中國政局不感興趣，或避免涉入中國政治的華人領袖。

1920 年的「學校注冊法令」引起英屬馬來亞華文教育自主支持者的奮力抵抗，這場英屬馬來亞華人第一次因本土性議題而展開的社會運動最後始終抵不過英殖民政府的嚴厲制行，而在 1917 年成立的「霹靂南洋華僑教育會」也在 1922 年 7 月被令解散。當時，擔任海峽殖民地立法議員的林文慶、聯邦議會立法議員的余東璇、霹靂州議會的梁桑南等人都為這項法令而忙碌，但鄭大平似採取置身度外的態度。

英方採取嚴厲的手段制行這項法令，除了關閉各地的華僑教育會，也包括驅逐反對這項法令的人士，其中包括檳城的陳新政。不過，注得關係的是，在法令通過後，制行嚴刑峻罰的同時，英政府在 1921 年竟然重新委任華人甲必丹，而獲得這項委員的是鄭大平。霹靂華人甲必丹，在 1906 年許武安過逝後就不再委任新的甲必丹，一直到 1921 年再委任鄭大平為霹靂州華人甲必丹。鄭大平在 1901 年就取代他的父親在州議會的職位，成為霹靂州州議員。英政府在建立相較完整的官僚體制後，有意結束「以華管華」的局面，而不再委任甲必丹是很明確的表現。可是，十五年之後，正當華文教育自主支持正處於與英方交戰的時刻，英政府在這時候重新委任華人甲必丹，令人不得不聯想到英政府的委任有其政治動機：確立親英華人領袖的地位！

四、 雙重政治身份

雙重政治身份，即擁有兩個不同政權正式賦予的政治身份。在霹靂州二戰前的州議員當中，梁碧如是最早擁有這種雙重政治身份的人；而另一位擁有這種雙重身份的人就是梁燦南。

梁燦南比鄭大平晚一年出生，生於廣東梅縣大竹堡。在他三歲那年，他的父帶他到檳城。歲十一，他的父親梁珍秀過逝，他和母親帶著父親的骨灰返回中國，其母管夫人卻在返鄉途中離世。雖然年幼，但他還是成功將父母安葬在梅縣。這位成熟的小孩贏得村人的贊許。

梁燦南的一生，是典型白手起家的故事，雖然同為霹靂州華人領袖，但他的生平與含著金湯匙出生的鄭大平截然不同。他的一生，可分為三個時期：1880-1910，從底層攀爬；1910-1920，奠定事業根基；1920-1940，政治生涯，領導華人社會。在 1898 年返回馬來亞後，他在怡保落腳，從事錫礦業，並且在梁碧如的礦場工作。1910 年，他在萬里望(Menglembu)、布先(Pusing)和發林(Falim)等開採錫礦，在 1910 年代把事業擴展到橡膠業。

1920 年，他取代胡子春，成為霹靂州議員，並獲得太平局紳(J. P)的頭銜。隔年，他擔任霹靂中華總商會 (Perak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華人接生公會

(Chinese Maternity Association) 主席等職。他是二戰前霹靂，尤其是近打縣華人社會最顯著的領袖，貼近一般華人社會，與英校生菁英派的鄭大平完全不同。

在他擔任霹靂州議員後，即面對的是 1920 年的學校注冊法令。這項法令在海峽殖民地立法局(Legislation Council)三讀通過後，送到聯邦議會立法局(Federal Council)，而余東璇是當時聯邦議會立法局的唯一華人。「霹靂華僑教育會」，公舉梁燊南、李荔坡及李可達，分頭向余東璇及白人議員陳情，請他們阻止這項法令在聯邦議會通過。

梁燊南的領袖地位是明確的，但他是個務實的領袖，「霹靂華僑教育」後在 1922 年被領令解散後。霹靂州華校維護者在噤若寒蟬兩年餘後，在 1924 年的聖誕節前夕，梁燊南在霹靂中華總適會招開霹靂華校校董會議，並邀請代表英方的教育提督司參與會議。在會議開始前，提督司建議他先迴避，以免有礙會議進行。梁燊南回答：“今日會議係光明磊落，無須避席。”顯然地，梁燊南欲提督司「督察」會議，以圖去除英殖民政府的華校組織的疑慮。在那場會議中，「霹靂華僑學校校董聯合會」正式成立，而這也是「霹靂華僑教育會」被令解散後的第一個霹靂州的華校組織。這個團體的章程在較繼的會議中通過，在章程中明確表示不涉及任何政治活動。

在他擔任州議員期間，多次為華人課題發聲。他在霹靂州議會中的最後一次記錄，出現在 1939 年 5 月 9 日。在會議中，他詢問參政司他在去年十月份呈上的「穩定霹靂州勞工備忘錄」的進展。在這個備忘錄中，他建議成位一個公司，讓各族的失業勞工可以獲得土地耕種稻米。可是，他的建議並不被霹靂參政司所接受，因為參政司認為這樣會引進更多中國勞工，而這是政府所要避免的。梁燊南在會上替自己辯護，表示這個公司是含蓋各種族，而非華人。顯然的，他的解釋並沒有獲得認同。之後，他就在霹靂州議會中缺席。是年十月，在病榻中，他透過霹靂州華民保護司 (Protector of Chinese)，上呈備忘錄給海峽殖民地輔政司 (Colonial Secretary, Straits Settlements)，要求設立彩券，以助英方與德國的戰役。再一次，他的要求並沒有獲得批准。他的這項要求，向英方釋放善意的成份，甚於獲利。根據霹靂華民保護司的報告，當時梁燊南已病危，隨時都會死亡。

梁燊南是同盟會成員，但顯然的並不活躍。在他奠定事業根基後，便極積領導霹靂州華人社會的各项籌賑救災。在所有霹靂州華人從政者當中，他是唯一開辦報紙的領袖。

1937 年，他凝集了一幫以客籍為主的董事，開辦《馬華日報》（Malayan Chinese Daily），而李孝式是這份報紙的副主席。可惜的是，這份報紙已在星馬失軼。

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把建設國家的程序分為三個時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及憲政時期。中國國民政府在 1928 年北伐成功後進入訓政時期，並且以六年為期。1936 年，國民政府在公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後，即頒佈「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並付予華僑參政權。同年，英屬馬來亞華人進行總登記。隨後，英屬馬來亞華人進行民主初體驗，在 1937 年的 8 月 27 至 29 日所進行投票，在八位候選人當中，梁燊南獲得最高票數。可是，中日爭戰中斷了他赴中國的參政之路。

1937 年是梁燊南滙集榮譽的年份。他在這一年的五月份接受英政府的「大英帝國優等名譽勳位」（O.B.E）的封賜，同年又獲選為「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馬來亞華僑代表」。在接受英政府的勳位後，客家公會替他舉辦歡慶宴，在慶祝儀式包括「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有意思的是，他獲封賜的消息經由吉隆坡領事館向中國外交部呈報，中國外交部回文允許他接受英方的封賜。這種詢問只是象徵性，因為在外交部的允許之後，梁燊南已接受英方的封賜。

空手而來，在榮耀但憂國憂民中撒手人寰，留下捐贈中國國民政府兩萬叻幣的遺願。他在 1940 年 1 月 20 日在波德申(Port Dickson)逝世後，遺體移回怡保。在他出殯那天，霹靂華人商店關門以示尊重，除了中國、英國及馬來官員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人民相送，送殯隊伍長達兩英哩。從他的死亡到葬禮，都獲得中、英媒體的跟進報導。其故事在 1940 年 1 月結束了，但他最後的話言卻透過他所創的《馬華日報》保留了下來：

吾僑僑居海外，對於國民總動員之物質動員，如捐資籌賑，募集寒雨衣，組織機工服務等，雖已不恤物力人力，踴躍進行，然求其能竭全力，捐軀救國，毀國紓難，充量發揮愛國精神者，實不多覩。撫心自省，良用漸悚，此後宜以精神總動員，互相策勵，父詔其子，友勸其儕，妻勉其夫，務使抗戰意志，日以堅強，物力人力，日以集中，庶日副 最高領袖謀國之誠，而收國家民族復興之效與與僑眾共勉之。

梁燊南臨終前向英政府示好遭拒，向中國政府方面的貢獻卻得到了褒獎的回饋。做為英方官員，他嘗試為華人在這裡的長住久安尋找出路；做為中方的民選國大，他雖然未能

展其政治能力，但顯然的，在情感上他是親中的。他的離世，也標示著一個時代的中結，日軍大舉入侵之後，霹靂州的華人社會進入了劉伯群的領導年代。

小結

英殖民政府在 1877 年就建立了霹靂州多元族群的政治體制，也給予華人在霹靂州獲得合法性的政治舞台。不過，這些政治舞台僅限於極少數的富賈或菁英，無法促成，也無意成就普羅大眾的政治意識。華人政治意識的濫觴，與中國政局關係密切，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少數的菁英已具本土意識。就如梁碧如為例，他在卸下檳城副領事的職位後雖然依活躍於檳城華人社會，但根據英報的資料，他似乎把重心置放在霹靂州多元族群的交流。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探索華人二戰前的參政史是有意義的，因為這透露了英屬馬來亞華人社會在政治傾及認同的多元性。

本文是以霹靂州為例，把華人從政者分為四類，即：一、政與中國政治；二、不參與中國政治，但領導當地華人；三、土生華人，英校生，為殖民政府所喜好；及四、雙重政治身份。這種分類方式，尤其是第四類，是唯獨屬於霹靂及檳城州的華人政治參與者之特質，還是二戰前英屬馬來西亞普遍的現在，這還需進一步進行比較及研究。

政治上的本土意識及中國性，在二戰前的英屬馬來亞華人社會是可共存的。然而，「中國性」並不是隨時間越久越而越淡薄，而是關乎政策及客觀環境。1930 年代，中國當局的親（華）僑及居住地的不友善政策，如國民政府付予海外華人選舉權，英殖民政府制定「馬來土地保護法令」，這形成一拉一推的力量，加上客觀環境—中日戰爭，使部份華人更傾向中國性，如梁燦南。不過，在這當中，在英政府管制下享有既得利益的華人似乎不被所動。因此，在研究馬來亞華人史當中，以華人之參政者為例，我們不可忽略其多元性。